

# 生命難題

## —— 選擇

何寄澎

關於「生命的難題——選擇」這個題目，首先想強調的是，今天我並不準備具體地提出以何種方法或提示，做生命難題的選擇。其次，因為我不是學心理學的，所以也不從心理層面，在理論與實際上做複雜的討論。至於生命的體驗達到智慧的程度，我也沒有。

因此我只就自己平常讀書的經驗，與今天主題有關的一點心得，和諸位分享。也許這點讀書心得不是多麼高深的意見，但至少是我個人曾經確實感受到的一個誠懇的看法。

由於我本身學的是中國文學，接觸到的書大多都與中國文學方面有關，所以現在我想透過四位大家較熟悉的古代人物為例，跟大家談談他們生命過程中的一些經驗，看看當他們面對生命中種種的挫折起伏時，所採取的人生態度和方法，倘若其中有些意見，是各位雖然知道這幾人卻未曾想到的，算是我的一隅之得。那麼，也就達到一點小小的貢獻了。

中央日報

副刊

八十三年

三月十六

至十八日

(中學國

語文)

## ● 在生死之間掙扎， 寫出文史傑作的司馬遷



↑ 在生死之間掙扎，寫出文史傑作的司馬遷。

大家一定都知道西漢的司馬遷，他的《史記》在中國歷史上，不但是史學鉅著，同時也是部偉大的文學作品。司馬遷是了不起的，而在他整個受教育的過程中，身為史官的父親司馬談，則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。對於培育這個兒子，他是有計畫且花費了非常多心血的，與今日的父母相較毫不遜色。

由於漢朝的史官採世襲制，因此父親既然做史官，司馬遷將來就必須繼承父業為史官。古代的史官就相當於現在所稱呼的歷史學者或歷史學家，然而因著時代不同，兩者的地位卻大不相同。

史官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對於歷朝政治、文化等不同層面的各種變化及興衰，都要鑽研通徹，他們的學問可說是十分廣博深遠的。但，即使他們是少數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，在專制的王朝統治下，史官的地位其實是很卑下的。司馬遷就曾說：「主上之所戲弄，倡優蓄之。」意思是：在君主的「目中，史官不過是他玩弄的對象，就像養戲子藝妓一樣罷了。

正由於君王的不看重，於是大多數的史官，本身可能對自己沒有深刻的自覺認識。只想著只要能答覆君王的問題就夠了，對自我也欠缺更高的期許。而司馬談、司馬遷不一樣。對於司馬談，可惜沒有豐富的資料流傳下來讓我們了解。他唯一的意見，只能從《史記》〈太史公自序〉中提起過，司馬談對先秦諸子、九流十家，分別做了一種價值高下的判斷。文字簡單扼要，至今卻仍是研究中國古代思想的重要觀點。

由此可知，司馬談的學問應該非常好。這樣的父親，對兒子的期許自然很高。他知道要訓練年輕人做一個優越的史家，需要很完整的教育。所以，在司馬遷二十歲時，父親就排除萬難，爲他安排了一分極壯闊的旅行，用今天的眼光來看，絕不遜於所謂的環遊世界。

司馬遷從當時的長安附近出發，然後往西南邊走，沿著長江流域一直到東南，再從江浙一帶北上，到今天的山東，也就是古代的齊魯，再左折回來，沿著黃河流域回到長安。除了極南邊境以及西北邊之外，西漢的版圖他大概都走過了，因此可知，司馬遷的偉大是其來有自的。我們後人讀《史記》，可從那豐富的資料見到司馬遷深刻的智慧與感情，這與他二十歲的旅行絕對有關。比方——

當他走到汨羅江畔，遙想屈原的志節懷抱，不禁流下淚來；到了春秋時的魯國境內，雖已是西漢王朝，但魯此地的鄉射禮還維持著，可以想像魯國文風的興盛，他曾在孔廟前流連低徊，表示對孔子的嚮往，他覺得文化應該是這個樣子的；爾後，他到孟嘗君當年的封邑——薛地，就感受到完全是不同的風俗，後來，他發現原來孟嘗君在此地曾經移入六萬戶好使血氣之勇的暴桀子弟，才使薛邑的風俗改觀。

就這樣，司馬遷在父親刻意的栽培下，慢慢累積了他的學識、素養。所以，他在三十歲左右就破格被提拔，做了漢武帝的郎官。郎官就是皇帝的侍從官，在漢朝的制度中，原本是有學問、儀表好的貴族子弟才能擔任此官。而剛登基不久，也想大展鴻圖的漢武帝，卻看上了司馬遷的才華

和能力，特地拔擢他到身邊做郎官。我們可以想像當上郎官的司馬遷大概很高興。因爲這件榮譽的事，使他的仕途看似一片光明，往後的日子應該是一帆風順。

然而，命運往往是很嘲諷的。他就在當郎官時認識了李陵。我舉司馬遷的例子，主要是想談他一生之中所受最嚴重的挫折——遭漢武帝所處的「宮刑」，而這件事與李陵有密切的關係。

雄才大略的漢武帝，對於北方強大的匈奴有好幾次的征伐之舉。這些征伐的舉動，成就了一些立大功的名將，如衛青、霍去病，卻也造成了另一些人的悲劇。如李廣、李陵。對於李陵的故事，大家都應該耳熟能詳了。

他和李廣利將軍聯合出征攻打匈奴。李陵率五千名騎兵做先鋒部隊，偽裝成誘餌深入不毛之地，企圖引出匈奴的軍隊，再與李廣利的軍隊裏應外合，給予匈奴重擊。但是，李廣利的那支軍隊卻沒有如期趕到。所以李陵只好且戰且走，以五千人面對匈奴的八十萬大軍，最後必是悲劇英雄的結局。以李陵的家風，他絕對是抱著必死的決心繼續奮鬥。但不知是什麼因素作祟，李陵沒有自殺，就被匈奴人生擒成爲俘虜。此後，便開始了李陵非常悲劇性的命運。

從歷史記載可知，李陵祖孫三代都是悲劇人物，倘若扯遠來看，司馬遷將李氏家族的過錯，都含蓄地歸於漢朝朝廷的苛刻，有功未必賞，有罪必當罰。因爲謠傳李陵投降了匈奴，使漢武帝情緒很壞。眾所周知，政治是沒有是非可言的，於是其他的臣子紛紛落井下石，批評李陵是貪生怕

死之徒，因此龍顏大怒，李陵全家被誅殺，他自己也就留在匈奴永遠不能回來。

而天真的司馬遷認爲，雖然與李陵並沒有什麼交情，可是因爲同事關係，同在皇帝的左右出入，他對李陵的爲人處事，有非常高的評價，所以他不相信李陵會是這種人，在後來他寫的《報任少卿書》這封信中，我們可以很清楚知道司馬遷是這樣想的。他說：「我與李陵沒什麼交情，也從未跟他喝過一杯酒，吃過一頓飯。但我看他平日的行爲，對待他的士兵仁至義盡，對待父母非常孝順，與朋友交言而有信。我以為他有國士之風，是當代少有的高潔之人。事實上，他應該是忍辱負重地生活在匈奴族中，等待和漢朝軍隊裏應外合的機會。」

爲了寬解武帝的心情，及洗刷李陵的冤屈，司馬遷出面替李陵說話。沒想到武帝不聽，還勃然大怒，把他交給嚴苛的吏（執法人），本來是要判處死刑，而漢代的死刑是可以錢贖的，但司馬遷沒有錢可贖，是後來武帝覺得這個人不錯，又曾被自己提拔，於是就網開一面，予以宮刑。受過宮刑的人就與宦官沒兩樣，而宦官是地位最卑賤的。司馬遷作夢也沒想到他的一番話，使他整個命運改變了。因此我說命運往往是很嘲諷的，不當郎官就不認識李陵，不認識李陵就不會替他說話，也就不會得罪武帝，不會受到宮刑，這是一連串巧合累積而成的。

孟子說過「以意逆志」，受到宮刑的司馬遷覺得從沒有人像他這樣不幸，這種不幸不但是他自己一人，同時也侮辱了祖先

、侮辱了司馬氏一族的人；強烈的悲憤之情使他準備死。然而，在死與不死之間，他非常猶豫，他面對了生命中最難的選擇——死亡。如果他對得起祖先，他應該死，但「死」可以解決問題嗎？「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」，一旦他死了，不僅無法完成父親對他的期望，也會讓漢朝種種不合理永遠繼續得逞，而沒有人知道他的可惡。他的內心矛盾，不斷在生死之間掙扎。

我們可以透過〈伯夷列傳〉這篇文章，去了解司馬遷做選擇的心路歷程。這篇文章很特別，一般的列傳都是敘述主人翁的生平事蹟，然而〈伯夷列傳〉沒有，內容完全是司馬遷個人心境的表白，而且文章短，內文又非極有秩序的，並不容易閱讀。周武王伐紂勝利後，當天下所有人在慶賀新王朝誕生時，伯夷、叔齊卻隱居首陽山，最後竟因無可吃之食，終至餓死。

臨死前，伯夷唱了一首悲哀的歌，大意是：「我登上西山，採薇而食。時代為什麼如此不幸呢？改朝換代不過是人類之間以暴易暴的行爲，然而施行暴亂的人卻不知自己是錯的。我不幸處於這個時代，唉！算了，我餓死算了！」

孔子對這件事曾評道：「伯夷、叔齊不念舊惡！怨是用希。」又說：「伯夷、叔齊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？」孔子認為他們心中是無怨的。可是剛開始，司馬遷將自己的遭遇投射到伯夷、叔齊的身上，相信伯夷、叔齊是非常怨恨的，所以對孔子說他們的無怨不以為然。最後，他終於想通了，因為他想到孔子又說：「富貴如可求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爲之。」儒家並不反

對追求富貴，但關鍵在「可不可以強求」？如不可求，那就應當「從吾所好」，順著自己所好去追求理想目標，所以孔子才說「道不同不相爲謀」，司馬遷自己最終也說：「亦各從其志也。」

如果用心去體會〈伯夷列傳〉的意義，我們會發現這是一「輕與重」的問題，若能再仔細去想，會發現這更是一「取與讓」的問題。通篇〈伯夷列傳〉很委婉但很有力的告訴我們：在生命裏，每個人要懂得「讓」。

司馬遷的抉擇很困難，因為他不知道要讓什麼。他讓掉生命嗎？他不甘心。縱使不要讓掉性命，但在武帝的淫威下，他又覺得痛苦。所以他從孔子談到伯夷的例子，去體會其中重要的關鍵。

我們都只是平凡的人，處在這個時代，大概不會有像司馬遷那樣嚴重的不幸，也許有人會覺得舉他的例子比較遙遠。但是，這並非古今時代遙遠的問題，我們要注意的是將這種精神還原到現實生活中，讓我們得到啟發、運用。大多數的人不都常常在面臨選擇時猶疑不決，徘徊不定，往往在追悔中讓生命流逝而去。

我覺得透過司馬遷的例子，讓我們知道在人生應有所取捨，魚與熊掌是不可兼得的。而在面對生命的難題時，所做的選擇是取，但相對的卻要有另一個認識和修養，這說來容易，做來難。即：你既取了這個，就要讓掉其他的。何時該取又何時該捨，這需要智慧和勇氣才做得到。



↑漢武帝像

## ● 為傳統知識分子走出新路的陶淵明

←陶淵明最可愛之處，在於他將自己的喜怒哀樂等情感，自然地表現出來。



如果要在中國三千年的詩歌發展史上尋找偉大的詩人，我認為第一個是屈原，第二個是陶淵明，第三個是杜甫。屈原是最早、最偉大的詩人，雖然我没舉屈原為例子，不過他與司馬遷是類似的遭遇，而屈原寧可選擇跳汨羅江。這兒我要順道提一下屈原及陶淵明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影響。

屈原的偉大是歷代文人所公認的，讀《楚辭》和《離騷》，我們會感受到那種充滿感情、忠愛情操的高潔靈魂，這在人世間是很少見的。後來中國的讀書人在歌頌屈原之餘，內心總會有個感覺，就是世上會出現幾個屈原？或者說，有幾個人能做屈原？屈原可以為了他的不被信任而放棄生命，然而「死生亦大矣」，生命是嚴肅的，使大部分中國的知識分子雖然敬佩屈原，卻做不成屈原。於是屈原在他們的心中高不可攀，一方面讓他們尊敬，一方面又讓他們感到心痛，因為自己做不到，這種遺憾直到陶淵明出現才得以彌補。

司馬遷如果被視為一個偉大心靈的話，從他之後，專制政權越來越強固，儒者開始喪失了他們的原則，而與世俗妥協。東漢以後是更混亂的時代，到了東晉，陶淵明才為知識分子走出了另一條路。

在陶淵明尚未出現以前，知識分子若遇到現實問題不能妥協時，他往往只能以終結生命求解脫，而陶淵明卻是回歸田園生活，不問世事問桑麻。他的做法可說是為知識分子樹立了安身立命的另一種典型，而這個方法又不會傷害自己本身。

在當時，陶淵明的思想是與眾不同的，讀《桃花源記》可知他的理想固是無政府狀態，而人民應過著「黃髮垂髫，並怡然自得」的生活。正因為這是他心中的一個理想，因此桃花源並不真正存在。假若按照傳統知識分子的模式，身為讀書人的陶淵明似乎應當出仕做官，但他其實對政治制度是棄之如敝屣，可是他又對其妻兒有一分責任，他如果選擇回歸田園，家人可能就要餓肚子。不過，他和司馬遷一樣，幾經衡量，彭澤令他曾做過八十多天，但在最後一次的考量後，他還是不願為五斗米折腰，從此罷官回鄉，再也不出來。

可是回歸田園的陶淵明，事實上做了很大的犧牲。他既選擇了與人保持一段距離，則一切生活支出都必須靠自己。做為一個知識分子，我並沒有所謂的階級觀念，但平實地來說，一個非常有學識的人如果在短時間內與販夫走卒相交，也許會有一種樸實的感動。但要是長期交往下去

，我們會發現彼此欠缺了交談的可能，他們所談的，絕對不是陶淵明想談的，因為沒有交集點。所以陶淵明回到田園生活，可以說他的所學、朋友都斷了，這種犧牲不可謂不大。從他的作品，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寂寞。他在詩中說他碰到鄰居——一個農夫，兩人一相見無雜言，但道桑麻長。表面上看來，他與農人相處得很愉快，不過在這美好的情誼背後有寂寞在。他跟農夫能談什麼呢？談烏托邦嗎？不能；談政治嗎？也不能。所以見了面，只能互相寒暄問問種的桑樹長多高而已。

他住在很偏僻的鄉野，由於巷子太狹，很少車子會經過。因此他在詩中說：「窮巷隔深轍，頗回故人居。」由於朋友與他逐漸疏遠，所以他常是大門開著，一個人從早晨、黃昏一直坐到深夜，都沒有來跟他講話，這種生活是很辛苦的。他每天的生活是「晨興理荒穢，帶月荷鋤歸」、「夕露沾我衣」，每天所擔心，就是農作物長得怎麼樣了。他說夜裏聽到鳥「徘徊無定時，夜深轉悲」，覺得那隻鳥就像他，還沒找到自己的歸宿。他有沒有矛盾？當然有。

陶淵明當初在做選擇時，就已知道他以後的日子是寂寞的、辛勞的，生活的層次會降到最低了，可是他願意這麼做。讀《歸去來辭》會覺得他非常快樂，但大家千萬不要認為他全部的生活都是快樂的。陶淵明最可愛之處，就是與平常人一樣有喜怒哀樂的感受，而又表現出來。他回到田園之後，還是常常講到他的寂寞、辛苦、矛盾、痛苦，但這些都不妨礙我們知道他是定了，不會再出來，離開他辛苦經營的田園。因此，我們才能看到如此熟悉、平實而快樂的詩句：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，心遠地自偏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辯已忘言。」

以上所舉的例子是指遇到自我可選擇的情況，下面我要談的是指遇到身不由己、不能主動選擇的情況的兩個例子。

## ● 由憤懣之心漸趨平和寬容的柳宗元



由憤懣之心漸趨平和寬容的柳宗元。

柳宗元和蘇東坡同屬唐宋八大家，也是大家所熟知的人物，可是大多數的人都喜歡蘇東坡，而不喜歡柳宗元。原因何在？因為柳宗元的牢騷較多。不過我舉他為例，主要是要談他在面臨人生挫折時的幾次心情轉變。

柳宗元是個少年得志的人，他在二十二歲時就考上了進士，其口才和能力更是高超，無人能比。因此自然地，柳宗元就成了朝廷中所有王公貴人相互爭取為門生的對象。可是對柳宗元而言，少年得志是人生的不幸。當他三十歲時就成為改革派重要的一員，但諷刺的是，這個史稱「永貞改革」的運動，僅一年的時間就宣告失敗了。於是核心人物如柳宗元、劉禹錫都受到被貶官的下場，政治的無情讓中唐最重要的兩位詩人的政治生涯，竟如此不堪，古代貶官是沒有選擇自由的，三十三歲的柳宗元曾被貶到永州達十年之久，僅管中間遇到多次特赦，然而他始終是被除名於外的。在永州十年後，四十七歲的柳宗元終於可以回朝述職，他原先很高興，以為至此可以峰回路轉，有翻身之日。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柳宗元回長安之後幾個月，他卻被貶至更偏遠的柳州，劉禹錫的政治生涯也是如此。

面對這麼不堪的下場，柳宗元是怎麼看待的呢？大家都知道他寫過〈永州八記〉，也可能讀過其中的〈鉅鑿潭記〉及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。這些文章是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反映心情的代表作。或許有人覺得他的文章寫得不錯，但如果仔細閱讀作品內容，就會感到他似乎牢騷滿腹，烟火味太重了些。比方高三時讀的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中，大意是指西山是山中最特殊的！可是因為地處偏遠，沒有人知道它的存在；而自己也像西山一樣，是最優秀的人才，卻被貶到這樣偏僻的地方。西山的特別，是他所發現的，而柳宗元呢？誰會來發現這個人呢？

由這篇文章，可知他內心還不能接受被貶官的事實，所以他在永州十年當中，除了整天遊山玩水，什麼事都不做，他快樂嗎？但是隨著時光的流逝，柳宗元也反省了自己，漸漸地他改變了，從〈永州八記〉前後篇文章風格的不同，可以看出。以往他寫山水，總是刻意營造一股蕭瑟的氣氛與冷清的境界，藉此反映他的懷才不遇。到了最後兩、三篇作品，他竟然會以輕鬆的口吻和玩笑的筆法，寫了些神怪荒誕的事，使文章充滿詼諧的趣味感。然而遊記的作品畢竟也只是象徵，所以柳宗元改變得不多，我們無從了解。而永州待了十年之後，他回到長安，又重新燃起熱烈的情感與高度的期待，結果卻是晴天霹靂，被外放至更遙遠的柳州。曾經為自己的不幸忿忿不平，認為像他這麼了不起的人，怎會待在窮鄉僻壤的柳宗元，再度受到更重的挫折，但我個人覺得，此時的他已經延續他在永州後幾年那種徐緩平和的心，接受現實。他彷彿心如止水一般，沒有人看出他的心情，就這樣，他到柳州去了。他到了柳州之後，就很少寫文章，遊記也僅有一篇，柳宗元開始努力修孔廟、佛寺，目的是用宗教感化人民，修孔廟以提倡學術，並改變了當地百姓的迷信和奴隸制度。最後，他死於柳州，就傳統的知識分子而言，他的遭遇的確非常不幸，但今天如果到廣西的柳州去遊覽，我們會看見柳州百姓為他建的柳侯祠和紀念遺蹟，來永遠感念他。這那裏是他事先想得到的呢？

對柳宗元的一生，韓愈曾為這位好友寫了〈祭柳子厚墓誌銘〉，有精彩的評論。也許從傳統知識分子和學而優則仕的立場看，柳宗元是個失敗者。但韓愈卻幫他洗刷了世人對他的誤解。韓愈說：「柳子厚因為被貶了那麼長的時間，被貶至那麼偏遠之處，所以才留下佳作，他亦因此而不朽。」接著，韓愈又動人的說：「倘若柳子厚地下有知，我們可以問他：你要政途得意卻無這樣優秀的文章，或是選擇寧可有此佳文而甘願受挫呢？」一孰得孰失，必有能辨之者。」韓愈並未下結論，身為柳宗元的知音，他要大家自己去辨別。

從柳宗元的例子，可以啟示我們，在不可選擇的命運安排下，我們是以牢騷、憤懣、排斥的態度來面對？還是用比較平和接受的态度來面對呢？所謂「置之死地而後生」，假若我們能試著心平氣和的接受生活中的挑戰，往往能驅使人的生命開展出另一片新天地。

我認爲蘇東坡，是中國歷史上最可愛的一個人物。理由很簡單，因爲他隨遇而安。那時，由於宋代幾位傑出的文學人物如歐陽修、黃庭堅、王安石都是江西人，因此通都大邑所流行的都是江西文風。當蘇軾、蘇轍兄弟從遙遠的四川赴京考試時，並不寫開封當時流行的文章，偏偏主考官歐陽修排斥流行，因此他們就被提拔出來。結果榜單一貼出去，輿論譁然，一大堆匿名信、咀咒信都寄到歐陽修家中，有的人還更惡劣的寫祭文送他，不過歐陽修預言的沒錯，「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」證實選出的蘇東坡真的是非常有才氣，這場考試風波就逐漸平息了。

## ● 以樂觀曠達之心 看待人生的蘇東坡

中國歷史上，若要談命運的波折，沒有人比蘇東坡更嚴重了。他一生旋起旋伏，固然是因爲北宋的黨爭，但黨爭中卻爲何以他所受的打擊最多。原因出在東坡鋒芒太露、個性太率直了。由於他在儒家思想中，又夾雜了道家與縱橫家的思想，說起話來不太有心眼，就常常得罪別人，人聰明卻不懂得藏，所以總是遭人嫉妒。他因爲烏台詩案而坐牢，原以爲不能活著出來，幸而拜宋太祖臨終遺言之賜——「子孫不得殺文臣」，才得免一死。若在別的時代，蘇東坡早就人頭落地了，因爲他樹敵眾多，到處都有人排擠他。他寫的任何一首詩、一句話，都可能被扭曲成文字獄，雖然他比較想得開，但老是出入監獄也令他很害怕，所以當他被貶到黃州時，就準備隱姓埋名不與其他入交往。

他在與秦少游的一封信中說「往往爲醉人所推罵，自喜漸不爲人識」，敘述了他的生活是與村夫、村婦和小販一起喝酒吃飯，沒有人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蘇東坡，喝醉了就推來推去、勾肩搭背。說「自喜漸不爲人識」這句話，其實是很悲哀的。他覺得自己背負著太多盛名之累，所以才會有那麼倒楣的境遇。爲了怕禍從口出、怕被人陷害，到了黃州的蘇東坡，謝絕所有慕名而來的訪客。很快地，他就適應了當地的生活。

他在江邊蓋了間房子，雖然簡陋，但他說每天坐在屋裏就可以看到江面水氣氤氳，配合著山色、天色不斷變化，美不勝收。整個山水風景就在他的床上一覽無遺，他反而覺得這輩子不曾這樣幸運的。我認爲蘇東坡很會整他的敵人，怎麼說呢？他並不是故意的反抗，而是當初他的政敵原



蘇軾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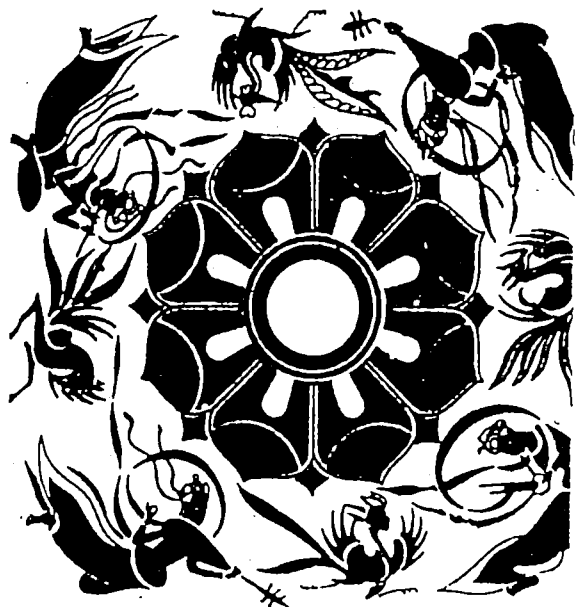


先把他擺到黃州，目的就是要他受苦受難，可是他老兄卻過得逍遙自得。林語堂先生說東坡在文章裏敘述的生活體驗，多數都出於想像罷了，不見得是事實。可是假設他的敵人看了東坡的文章，一定都會生氣或後悔，不懂為何他過得那麼快樂呢？

蘇東坡怎麼過日子呢？由於家中人口浩繁，而俸祿又少，所以根本不夠用。他自己在文章中敘述，每月初一時，便把薪餉四千五百元銅錢分成三十分，全部將他們懸於屋樑上，每天早晨就拿一根長竿子取一分下來，一天就只能用一百五十元，因為竹竿已叫人藏了起來，想再多拿也沒辦法。其實這是自欺欺人的作法，但幽默中卻又合乎人性。有時運氣好一點，有剩餘的錢就存起來，到了月底，也許還可以存個十幾二十塊請朋友喝酒。雖然辛苦一點，日子畢竟還是過下去了。

他在《超然臺記》中說：「凡物皆有可觀，苟有可觀皆有可樂。」天下事物都有他可以欣賞、讚美的可取之處，完全看每個人怎麼想。譬如在飲食上，不一定就非要喝美酒，其實我們喝完酒糟，加個雞蛋也不錯，多喝一碗，同樣也可以醞釀然，何必一定要喝法國XO呢？蘇東坡就是靠著這樣的觀點生活。《赤壁賦》裏的洞簫客遊赤壁時，見到山川景物變化，於是想到人生的渺小，慨歎連以三國時周郎、曹操的「一世之雄，而今安在哉」？可是蘇東坡卻可以將這種悲觀、痛苦的想法，轉換成快樂的一面，從另一個觀點反駁：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而萬物與我皆無盡也。」

這就是蘇東坡。他一生一連串的被貶官，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，換作別人也許早就憂憤而死了。因此比起柳宗元，他顯得更超越、更了不起。柳宗元是憑著他自己的智慧和反省，終於在永州後幾年體會出，用平和的態度來面對不可選擇的命運，而東坡則是以一種「凡物皆有可觀，苟有可觀皆有可樂」的態度來面對。對在座的年輕朋友而言將來你們涉世愈深，會碰到愈多哀傷和不愉快的事情，當你們慢慢感覺到生活壓力的時候，你們對蘇東坡的態度，就可以感同身受。世間事，不要只看壞的一面，面對無法阻擋的事情，就學著用東坡的態度去面對它。



→ 唐代漢井圖案。

## ● 總結

每個人的生命不同，所遇到的選擇、挫折都不一樣，所以我不可以，也不應該不負責任的告訴你們，用那些方法就能解決生命中的難題。也許以上所說的人物故事，各位會覺得距離稍微遙遠了些，但基本上，這只是認知的問題。我舉司馬遷、陶淵明為例，可以歸納出兩個簡單的道理：第一，在面對選擇時，當事人一定要慎重思考，所謂慎重思考就是把現實的狀況，與自己的個性、原則，完整而深入的斟酌，確定自己真正需要的抉擇。其次的認知是，相對於決定的其他選擇，都應該要心安理得地讓，不要後悔。如果不能讓，你永遠會在選擇之間徘徊不定，那你這輩子就只能在後悔當中渡過。

後面兩個例子是指人一生當中，常會受到命運的撥弄，有時，這些事往往不是你選擇，或願意承擔的。諸位千萬不要以為我們現在過得是太平歲月，因為這不能保證各位未來的生命沒有荒唐、滑稽、莫名其妙而為命運作弄的事情發生。就像這幾年兩岸開放，我們父親輩那些從大陸過來的人，他那裏想到四十年之後，竟然可以再回到故鄉，他又如何料想到，從前沒想到分手的分了，現在沒想到會見面的見面了。諸位不是當事人，不曉得這中間有太多的悲歡離合，太多的情何以堪。

我想柳宗元的超越和啟示，雖然來得晚一點，然而他終能超脫於怨憤中，死時內心應該沒有太多遺憾。而蘇東坡即使迭遭貶官的命運，由京城、黃州到嶺南，甚至連海南島都待過，但他的達觀，往往帶給他周圍的人快樂，也許他是從實際的生活體驗中體會到他自己的責任。雖然各位都還年輕，在臺灣的升學主義下，年輕人不是常常必須在不太有條件作選擇時，就已被迫選擇了，怎麼說呢？

諸位是否一到高二，就要面臨決定考那一類組。老實說，一個十七歲的孩子，他怎麼知道要走那條路才不後悔？而他們的父母有時也不見得能周到地替他們衡量取捨。不過這倒也不是說一旦選錯了，就永遠錯下去，因為人生本來就是不斷的摸索，而學問本來就是相通的，假如你唸了幾年某一門學科，才發現自己真正的志趣時，千萬不要猶豫，以為浪費了前面三、四年，而不願再走回頭路。這樣想就錯了。人一生有好幾十年，三、四年的光陰不算什麼，再者，原先走過的路早已留下痕跡，將來不一定什麼時候會發揮其作用，不管讀過那一本書都是有用的。

剛才我講了許多並不圓滿的例子，但誰能說那種生命是圓滿的？然而，就是這些大大小小的不圓滿，生命才顯得可貴。重要的是，我們的生命雖然不怎麼圓滿，如果大家願意在人生的態度和精神上汲取先人的智慧，學習我列舉的幾個人物或其他人，相信生命會變得至少在我們看來是圓滿的。

# 中學子國語文

吳大猷